新闻热线：010—58884050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责编 句艳华
科技日报
2016年4月2日 星期六

■桂下漫笔

梁思成如何谈“拆墙”

文·胡一峰

近来，拆除小区围墙的事引起一番热议。赞成者说，拆墙是拆除了“心墙”，并将之与民生、作风乃至社会心态等联系在一起，似乎社会一切问题都出在了墙上，一旦拆除，万事可成；质疑者则举出中国民居特色，拿出《物权法》条款，乃至打出民主、自由、法治等旗号来，又似乎保卫围墙天经地义、万事可成。这不由得又让人想起大约一甲子前的拆墙之争来，当然，那次争的是城墙而不是围墙，争论中的一份著名文档，后来以“梁陈方案”之名镌刻在了中国当代史的柱石上。

“梁”，是梁思成，人尽皆知；“陈”，是梁思成的合作者陈占祥，早年留学英国，师从阿伯克隆比爵士，因为参与大伦敦城市规划表现突出被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吸纳为会员。今人原原本本读过“梁陈方案”者或许不多，但借助这些年时常涌起的民国热，梁教授哭城墙的故事，已被戏剧化演绎得世人皆知了。当然，这段往事的是非对错，历史早有定论。本文重提，并非有颠覆性发现，只是想说，在类似拆围墙之类的城市管理和决策问题上，“梁陈方案”中论证问题的方式本身或许比结论更值得借鉴和思考。

“梁陈方案”关于城市布局的核心思想不出“平衡”二字。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应构建“多中心”，让每个区域有自己完善的工作、生活体系，以防止跨区域交通带来的集中拥堵。这一思想受到芬兰著名规划学家埃列尔·萨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影响，而且在陈占祥参与的“大伦敦”城市规划中也已得到了验证。不过，值得格外指出的是，即便在一甲子之后，我们依然要珍视梁陈方案，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已证明了其正确，也不仅是梁思成、萨里宁或某个爵士的名头，而是梁陈方案的论证方法和理路。

在这份文档中，梁思成和陈占祥老老实实、仔仔细细算了算账。

第一笔账是英美大城市的交通账：

“伦敦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运输工人，造成平均每七人中有一人以运输为业，将其他六人的身体，生产品和消费品来运去的不合理的、滑稽现象。洛杉矶百老汇路上，今日汽车的速度比1910年马车的速度还慢。纽约第五街并不太热闹的一段，汽车速度与步行相等。这种交通疾病，都是都市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第二笔账是北京的交通账：

“现在北京最主要的东西干道是长安街，并与通正阳门的公安街，西皮市等街接。依据1949年9月11日一次的调查统计，各种汽车辆最大的是东三座门西口，平均每小时49辆。自行车三轮车最大量是正阳门大街，每小时1649辆。当时北京汽车总数仅约四千余辆，又是汽油罕贵的时期，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假定政府各单位全部沿东西长安街、公安街、西皮市建筑起来，十年之后，汽车数增至三万辆；东西三座门的汽车流通量可能增至每小时六七百辆，或每五六秒一辆，三轮虽可能完全绝迹，但自行车必倍蓰；长安街上与天安门广场两旁汽车之拥挤将比纽约的商业区更甚，再加上无数自行车穿杂其间，其紊乱将不堪设想。假使在广场开大会时，可能使附近相当大的半径以内地区的交通完全停顿。”

在城市这门科学里，不需要道德义愤，也不需要鼓动人心的宣传，而是严谨细致的数字。

重读这些历史的声音，令人感动也令人反思。今天我们讨论拆墙、交通等问题时，往往震撼于某些图像甚或一个抓人眼球的标题，却很少看到如此细致的统计和计算。说话者的言说方式，往往取决于听话者的收听习惯。在一个情绪浮躁、心态猎奇的氛围中，言说者往往会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平和的讨论与细密的分析，也就容易被煽情和义愤所取代。

“梁陈方案”没有付诸实施，梁思成为此还受到了批判，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

这些充满哲理的语言，和已经成为一纸旧闻的“梁陈方案”一样闪烁着智慧光芒。时光流逝了五十多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当年列举的数字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但他们在此基础上揭出的问题和困境却被证实了，正如梁所言，“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拥堵、工业污染、人口膨胀。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又如他所说，城市是一门“科学”。科学要求的是严谨细致的数字，而不是鼓动人心的宣传。数字的坏处在于冰冷，不给人留通容的余地，但它的好处在于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思考路线，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无论映证、补正或反驳，都可以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相反，那些道德义愤的语言，虽然辞藻华丽、吸引眼球、喧嚣一时，却不过是个人观感乃至情绪的表达，除了扇乎起一连串的舆论泡沫，对于问题的解决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毫无用处，而待到泡沫散灭，留下的仍是一潭毫无改变的死水。

行文至此，发现标题可能起得有点问题，毕竟，梁思成当年谈的是不拆墙而不是拆墙，但这其实并没有关系，个中道理上面已经讲过了。

这里埋下的是亲人别离，埋不下的是情感和梦！

奠

死亡，是人类的一个终极思考。从无知，恐惧，躲避，抗争，不甘……终于到接受，理解，坦然，迎接，笑对……甚至，我们的先人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周代，就打造了一个以死亡为主题的节日——清明节。

经历了两千五百多个清明节，中国人对于死亡的思考，已经升华为一个必将降临的节日，如同每年的清明。这个节日不仅是精神上的寄托，也是农耕文明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重要时令。清明时节，气温变暖，降雨增多，不舍农时，春耕春种。节日定在春深处，恰逢漫天好雨时。也真煞费了古人的一番苦心。

朝胜知道清明节又叫寒食节时，还是没有上学不识字的时候。同样没有上学也不识字的爷爷，却用地道的河南话给我讲了“姐自吹”割股奉君、不食君禄的故事。后来长大读书了，才知道那个忠臣孝子叫“介子推”。

忠臣介子推死于晋文公逼他出山的烈火之中，晋文公就规定了那天不能动烟火，饿了就吃冷饭，又成了“寒食节”。小时候只是纳闷，清明不是一直都下雨吗，雨中为什么就能点燃那么大的山火？

从对一位忠臣孝子的纪念，演化成对先人前辈的祭奠，这是对死亡思考的丰满；死如秋叶之静美，却在春华萌发蓬蓬勃勃的春天里祭祀，这是对生命理解的酣畅！

清明的墓园，一年比一年热闹。本该清冷寂寥之地，突然变得如集市般的喧闹。一块块墓碑被擦洗得一尘不染，挂彩带、插鲜花、摆水果、祭香烛……西方有一种让生者与亡灵对话的法术，叫做“通灵”。清明墓地，似乎就是中国人的通灵之地；清明节日，似乎就是中国人的通灵之时。

广东人把清明祭扫，叫做“拜山”。清明前，匆匆赶回老家墓园拜山的人们越来越多。挈妇将雏扶老携幼，到先人的坟前祭拜一番，之后便欢欢喜喜地踏青游春去了……

屈指算来，中国人每年要过的节日真是不少，传统的、现代的、民族的、宗教的、东方的、西方的、放假的、偷空的、神鬼的、革命的……

朝胜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自然不会迷信神神鬼鬼。可是，对清明节却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文化厚重。怀念祭奠前辈亡灵，是对今人一次灵魂的洗礼。就在这个春雨潇潇的清明，就在这个逝者长眠的墓地，可以对曾经生你养你的亡者说点什么吗？

有些表现国民党溃败大陆的一些革命影视作品，常常会有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到老家奉化母亲坟前默然伫立的镜头，配之于昏昏暗暗的环境、呜呜咽咽的音乐，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境，表达了蒋家王朝的穷途末路。奇怪的是，每当此时，朝胜就会大逆不道地陡升敬意。大势将去，大厦将倾，与谁倾诉，唯有亡母……这是一个失去了天下的孩子，在对母亲委屈地倾诉。

也曾看见一张黑白的照片，一个诗人写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之后，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在父母亲的土坟前久久垂首伫立。他有改天换地的伟力，却难圆重见父母的残梦。在他的梦里还有一位“直上重霄九”的娇杨，他赢得了天下，却失去了亲人。心中多少话，更与何人说？“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人世间居然会有许多只能向亡灵倾诉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到墓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长跪在长辈的墓碑前，躬立在同辈的墓碑前，颓坐在晚辈的墓碑前。有终身难忘的呵护教诲，有手足撕裂的恐惧痛楚，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长悲大恸……这里埋下的是亲人别离，埋不下的是情感和梦！

行走江湖，任何一个夜晚、任何一张卧榻。闭上眼睛就会亲人团聚，音容笑貌栩栩如生，醒来泪湿长枕，心绪久久难平。回到这里，抚摸墓碑细温挽文，冰冷中似乎在传递着某种信息。方才明白，这里才是梦归之处……

淋淋漓漓的清明，梦里梦外干湿浓淡地皴洇出一幅庄周之梦。满眼盛春，满心葱翠。再借一天纷纷细雨作伴，去喝一壶杏花村销魂的老酒。

纯洁的目光

文·问 天

在老柴D大调第二乐章略显凄楚的旋律中，我开车走在通向顺义南法信镇大江洼村的路上。

头脑里不时会冒出这样的疑惑：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没有生身父母的溺爱，从孩提时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各自不同但同样让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过早地压在他们弱小的身上……他们愿意接受一时半会儿难以发出乐音的小提琴吗？愿意和我这个难免会“强制”他们的陌生老同志合作吗？当了半辈子记者，也算见过些世面和人物的我，竟然多少有些忐忑。

孩子们还没下课，汪老师领我四处看看。在“乐器室”，热心人士捐赠的小提琴凌乱地码放着，还有两台钢琴让我意外。回到办公室，不一会几个小脑袋从门帘探进来：老师好！稚嫩的嗓音让人心动。

8个女孩子，从9岁到14岁。为什么没有男孩，她们的解释是他们学钢琴，汪老师课后告诉我是怕他们调皮。

想多和她们互动：“为什么要学小提琴？”

“因为她是乐器王子”“小提琴的声音像人”……七嘴八舌的回答让人吃惊。为了不辜负她们的回答，尽管屋里暖气坏了，我还是穿着棉服全力举办了小型演奏会——按照小提琴的“特色表达”，依次用古诺的《圣母玛丽亚》、《新疆之春》、《辛德勒名单》来分别诠释“爱”、“欢乐”、“忧伤”。

很难见到这样纯洁的目光、纯洁的凝视，从技术上看，这远非完美的琴声竟然从第一个音符响起，就和孩子们融为一体。她们用这没有任何杂质的目光，给了我最大的回报，给了音乐最大的尊重和热爱。

为她们装弦、调音；教她们持琴、握弓。她们不断“老师！老师！”地喊着，让我看她们的姿势是否正确。那灿烂的脸庞洋溢着兴奋。

要结束了。我说想用她们点的一首乐曲结束今天的课。她们欢呼起来：“小星星！”伴着她们的歌声，我似是而非地拉着。“再来一首！”她们齐声说了一首我并不熟悉的宗教歌曲的名字。好在有钢琴谱，还是我拉，她们唱。唱得那么用心，那么虔诚。

我要走了。她们在汪老师的提醒下向我齐声道谢。

而我心里却只有一个声音——谢谢你们纯洁的目光！

清明 老树

烟雨十里春深，落花轻覆草痕。
陌上青青柳色，心中念念故人。

■吾心吾性

相戒不谈风雅

文·陈 莹

对画画，我是门外汉，终究只是雾里看花。但画家老树的画，看得我心花乱开。

老树说，画画本来就是件好玩儿的事儿。他的画里有非常传统的山水，有细笔勾勒的花草，有的近似漫画，有的意境悠长。讽时骂事，自伤幽独，闲情逸趣，念彼怀人，他是画着玩儿的，笔墨世界是他的桃花源，他却并非躲在格局逼仄的小世界里自成一统，而是阅世走人间，大笔一挥泼泼洒洒全是现实人生之断面。

玩儿的就是生活。

他的画给人的感觉是亲切熟稔，又带着民国的老旧风味。场景中的人物穿水墨长衫，却做着现实生活中每个普通人的事。烦恼、困惑、懒怠、愤怒、郁闷、忧伤、欢喜、舒悦、怀念……如果感情只可用文字直抒胸臆，却不能肆无忌惮地形诸笔端，若要用画表达这些情绪，只有通过具体的物象和情景。老树所画的情景无一不带着生活的情味，柴米油盐、花草虫鱼、高山大海、老屋荒田，生活中这些难描难画若未被捕捉就一闪而逝的生活片段被他框在纸上，存在画里，谱就一曲水墨染成的长歌。

若只看画，不看诗，恐怕还看不出老树是个愤青。

宋人吴龙翰《野趣有声画序》中有云：“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在老树笔下，画和诗是一体的，看似漫不经意信笔恣肆流出，既望之下，却忍不住拍案叫好：

“少年在山上，爱看乱云飞。豪情千万丈，你说咱怕谁。后来进了城，万念渐成灰。偶尔到楼顶，听听大风吹。”

“昨夜无事窗前坐，一枚流星落尘埃。人生此来为何事，无非担水与砍柴。”

“何时不用再上班，看人脸色挣小钱。临水种上半亩地，闲听夜雨落荷田。”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曾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时事政治、社会现象、家长里短、看不惯的、想不开的、管不得的、气不平的……老树的诗近似打油，却声韵铿锵，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些看似漫笔吟成的小诗所做试图打通古今语体的尝试。语汇的强烈古今对比所造成的冲击，又巧妙地消融在作者营造的悠远意境中，产生一种奇异的和谐，嬉笑怒骂令人读之耸然一惊，不禁“啊”了一声，随即却会意一笑，原来是这样。

老树的画是当代“文人画”。老树的文人画中有风骨，存妙想，方寸画纸间劲舞虽少而意常多，简单的物象勾勒出另一方不止有四角天空的世界，既是画者本人因外物触动心声而产生的灵思感悟，又是画者有意为之的留白，在大片留白中空任我们思绪驰骋的无限疆域，正是“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

老树言：“画画，乃至其他一切预言的表达，无非是诚恳与自由。有大诚恳在，可见出真的性情与大的襟怀。有自由之心境，可言语无碍从心所欲应对裕如。”他写的直，似已将画中意思点透说尽，只这一点，就点破了宋元以来含蓄蕴藉的文人画意。抱着这种自由与诚恳，老树的绘画艺术并非凌驾生活之上，他写的画的反映的就是生活本身。——也许，观老树的画，读老树的诗，我们应该相戒不谈风雅，他的作品，满满的都是生活。

■乐享悦读

也读贾平凹的《极花》

文·张 涛

我对贾平凹没有系统的阅读，有关的阅读都是断断续续的，还有不少作品没读过。不过，他最近的两部长篇，我算是“跟踪式”阅读了。先是读发表在《收获》上的《带灯》和今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的《极花》。说实话，读完两部作品的感觉都不是很好，或许是因为对于贾平凹的期待太高了。

《极花》简单说，就是讲述了一个被拐卖女子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命运，从反抗到妥协，直到生了孩子后的“最终”妥协。拐卖妇女在前些年是个社会热点，直到今日也偶尔会从新闻中看到一些关于解救被拐妇女的新闻，也知道了那些女子的悲惨遭遇。贾平凹写作《极花》是源于十余年前看到的一则新闻，这则苦难与悲歌，压在他的心底许久，直到他在《极花》中写尽了这一切。

近年来，当代一些作家的创作有一种“新闻化”的趋势，如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与《极花》也属此类。我以为作家创作的灵感或内容来源，可以是新闻报道、社会热点，但应该对此进行沉淀或艺术化的处理。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可能会因为立场、视角等各种原因“不识庐山真面目”。所谓沉淀，就是要利用时间，尽可能地与现实、时代拉开距离，这样可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明白，同时情感经过沉淀后才会有所节制。我以为，好的小说也需要沉淀与节制。艺术化地处理，就是小说要与新闻报道拉开距离，甚至要断裂，要相向而行，而不是在具体细节上的丰富与完善。如果小说的主体内容、情节与新闻报道大体一致，小说的艺术价值就大打折扣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贾平凹的《极花》就存在着这方面的弊病。在此，我对贾平凹的创作有个独断，我以为他最好的小说就是《废都》，用王富仁教授的话说，《废都》是贾平凹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断裂。而近来的《带灯》与《极花》则不是这样断裂的姿态。贾平凹这样的姿态我们也可理解，《废都》当年招致的围剿，或许时至今日也让他心有余悸。断裂带来的是风险，和谐共处则风平浪静。

卡尔维诺说过：“当我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时，表现我们的时代曾是每一位青年作家必须履行的责任。……源于生活的各种事件应该成为我的作品的素材；我的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然而我很快发现，这二者之间总有差距。我感到越来越难于克服它们之间的距离了。”我以为当年卡尔维诺在写作之初遇到的难题，也是贾平凹在近期创作中呈现的问题。能否克服文学与社会热点题材间的距离，是这类写作成败的关键。

我以为《极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人公的不断妥协，缺少一种“主观战斗精神”。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我完全理解她的妥协，甚至以为多数如她这样悲惨经历的女子也只能这么选择，这么活下去。但文学作品，似乎不该如此“软弱”，应该有反抗的力量。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正义，应该在文学的世界中获得“诗性正义”。好像主人公的过于“软弱”是近来创作中的一个现象，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就是典型。我们的作品中缺少一种“拉斯蒂涅”式的人物，尽管邪恶，但充满了力量。

恕我愚笨，我总以为写作长篇小说是个“力气活”。每写一部都会元气大伤（当然元气充沛者可能例外），写完后该好好休养，养足写作的“气血”。写作的“气血”充盈了，作品才会酣畅淋漓，尽情尽兴。写作后的自我休养是需要时间的，短则一两年，长则五六年或者更久，这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了。休养就会“耽误”写作，随之名气与收入都要受到影响。但我以为“气血”充盈的写作，远比那些“贫血”的作品好。丁玲说过“一本书主义”，这可能有些极端。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而言，少写或慢写终归是好于“短平快”式的写作。毕竟，一个优秀的作家不是靠作品的数量来刷存在感，而是以作品的精神质量来确立自己的位置。

科技日报 608
邮箱：1611419167@qq.com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